

王东风 著

跨学科的研究 翻译研究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

王东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王东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0468-4

I. 跨… II. 王… III. 跨学科学-翻译-研究 IV. ①G301②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266 号



跨学科的翻译研究

王东风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61 千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468-4/G·1287

定价:4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 1983 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 21 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 2000 年、2001 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 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 33 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21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外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序

许 钧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有些困惑,也有些担心: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途径日益丰富,翻译研究渐渐地从边缘走向了学术中心,如今的人文社会学科,凡能与翻译有点关系的,几乎无不在关注并开始研究翻译问题。这固然是好事,但与此同时,翻译研究却面临着失去自身的危机,因为其他学科研究翻译的目的在于解决自身的理论问题,虽然可为我们探索翻译问题给予启迪,提供某种理论参照,但翻译研究若不以“翻译”为本,关注自身的问题,使研究向系统、科学的方向发展,那么,翻译学科的建设将是一句空话。由此而引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在多学科介入的跨学科语境之下,译学研究应如何保持自身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在思考与困惑之中,欣喜地看到了王东风教授的书稿:《跨学科的翻译研究》。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要进行名副其实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其原因有三:一是研究者必须要对翻译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理论有相当的了解和把握,对翻译的跨学科语境有清醒的认识;二是研究者必须将整个研究落实在“翻译”上,如我在上文所说的,以“翻译”为本,紧紧围绕着翻译的基本问题展开;三是研究者必须把握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有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并对译学研究的趋势有前瞻的目光。面对挑战,王东风教授没有退却,而是迎难而上,勇敢探索。做研究,要有勇敢的探索精神,要有理论胆识,而在国内翻译理论界,应该说王东风教授给人的突出印象之一,就是敢于探索,往往

能见他人之未见,言他人所未言。但是我们知道,一位学者,除了勇敢的探索精神还不够,还须有宽阔的理论视野、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目光,不然,很难把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真正做出价值来。

带着对作者的勇敢探索精神的赞许和对其研究价值的期盼,打开了王东风教授的书稿。单从目录,便不难看出作者有着明确的理论追求和精心的理论构建。全书共分四编。前三编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对翻译行为的不同的理论视角,而最后一编,即第四编,则从微观的文本切入,在译本分析过程中展开了一个宏大的译学叙事,将多学科的视角几乎无死角地投射在译本研究的平面上,再现了译本运作过程中的语言、文化、诗学、历史、哲学、政治、社会学等不同作用力对译者决策的影响,全书由此而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追求:力图构成一个有机的跨学科译学研究内在体系。目前的译学研究者的研究范式,或经验主义,或语言学,或诗学,或文化学,但基本上还是各说各的话,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能系统地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熔于一炉的还不多见。该书的出现终于使“跨学科的译学研究”这一理想,从口号走向了现实,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尝试。

于是,我们在第一编“连贯的张力: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里会看到经验主义和语言学译论中乐见的那种“例句分析”,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分析已经融入了跨学科的研究思路。这一编里所涉及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就有语义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同时也有其他学科的理论介入,如诗学、修辞学、认知理论等。第一编共有四章,以连贯为核心,从语言的角度,对语法、语义、语用和文体四个方面展开了对翻译的立体式的研究。表面上看,所涉及的方面还不能穷尽语言的各个方面,但真正从事翻译研究的人就会看出,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翻译研究所应关注或被忽略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已经成熟的研究领域,该书有意识地跳过了。

第二编“形式的魅力:翻译的诗学研究”把第一编中有关语言

的讨论引入了诗学的视野之中,对形式与内容在翻译中的体现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既有诗学对言语美的辩证认识,也有后现代诗学的那种善于反思的反叛精神。这一编的前两章涉及的是传统翻译理论的核心:忠实与通顺,但作者没有走人云亦云的路子,而是独辟蹊径,从解构主义和诗学的角度,对译学传统中似乎无可争议的“忠实”和没有争议的“通顺”都作了深刻的反思。该编的另外两章“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和“形式的复活”也是不乏创意的思考,提出了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中作家和译家的审美意识与文体能力上存在着冲突的问题,并从诗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内容与形式的审美关系,从而也进一步加深了自第一编起对语言与翻译的关系的认识。此外,这一章所涉及的文化问题,又为第三编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如果说第一编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范式,第二编是在结构与后结构之间的边缘往返的话,那么第三编“操纵的魔力:翻译的文化研究”就基本上就是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了,研究的视野就此转向了翻译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追问译本生成的历史和文化动因。这正是研究范式的不同而形成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在这一编里,作者采用了文化比较和后现代理论中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甚至文化控制论等手法,对翻译与文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必须指出的是,作者在这一编里,虽然运用了不少西方的理论,但却并不是那种盲目的应声附和,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且对外国学者的理论大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对奈达的同等反应论的批判、对勒弗维尔的意识形态与诗学分野的商榷、对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的修正,而且能有效地将外国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运用现代理论重新审视了一些被传统译学理论误解或忽略的问题,如在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翻译所起的作用、对严复和林纾的再认识、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学者的文化立场和角色定位、乃至被操纵的翻译对“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和欧美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

响等。

九九归一,最后一编“文本的引力:翻译的综合研究”自然还是落到了译学本体上来,在这一编里,作者将译本作为综合应用跨学科理论的检验场,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具体的译本分析中融入不同的理论思考,为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作了一个有益的示范。

综观全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十几年来与王东风教授的学术交往中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富有探索精神,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理论视野广阔,但又始终以“翻译问题”为研究根本;勤于思考,好提出不同的观点。书中各篇都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刊登过,从中倒又让我看到了作者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作者在二十多年来的研究中,始终有着一个明确的方向,随着译学研究的发展而使自己的研究不断深入,由此,从王东风教授的研究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近二十年来国内外译学研究的发展轨迹和某些前沿成果。对这样的研究,我们不能不给予关注,而对译学探索中提出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对作者在书中以“论辩性”的笔触提出的一些也许有些“偏激”的观点,相信译界同行也一定会做出自己的思考,做出相应的回应,从而将译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而这也许正是作者将自己近二十多年的译学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与总结,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译界同行的本意所在吧。

2014年1月10日于南京大学

自序

翻译是一种十分有魅力的语言和文化实践,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当我们在经历方块字与字母词之间的转换时,看到了美的再创和再生,那是一种美的享受,会让人忘却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只有在翻译中,只有在两种语言的交流中,只有在两种不同书写方式所表达的美之间的转换中,我们才会真正感觉到语言那无限的美的生产力。如果是文学翻译,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文学家用语言创造千姿百态的美的能力和技巧,而且还可以让那奇妙的语言符号把自己带进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情境之中、带进遥不可及的历史氛围之中、带进深不可测的想象世界之中。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如果是非文学翻译,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地,不同语体不同学科的文本同样利用语言在创造另一种美,那是一种语体上的规范美、交际上的信息美、学术上的科学美。这种美只有在经历了翻译这样的语际转换,才能真正感受到语言那呼风唤雨、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当我们目睹了被语言改变和创造的现实的时候,我们同样会有一种美的成就感。

翻译研究也是一种十分有魅力的语言和文化实践,充满了思辨,充满了挑战,因此也充满了乐趣。文化交流中,翻译那无所不在的触角决定了翻译学与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学的、哲学的、美学的、文化学的、心理学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逻辑学的、人工智能的、数学的、生态的、生物的等。无论从哪个侧面看翻译,我们都仿佛看到了翻译的全部,而其实那只是多面体的翻译的一个侧面。如果认为我们看到的那一面就是翻译的全部,那可就像盲人摸

象了。其实,面对翻译这样一个莫测高深的语言文化现象,我们何尝又不是睁着眼睛的盲人呢?当我们振振有词地发表着极具排他性的理论话语时,我们仿佛就像是一个盲人在笑另一个盲人有眼无珠。人,毕竟是人,总有能力的极限。翻译学广泛的跨学科性注定了没有这样一个通才能通晓所有相关学科的系统理论,从而把那多面体的翻译学的方方面面都解析得面面俱到。然而,这就是翻译学的理论魅力所在。一览无余的美唾手可得,但那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美,而只有那深邃无极、充满未知的美才真正具有引人不断遐想、不断追求、不断征服的魔力。

我在大学时代就喜爱文学翻译,在校期间翻译了许多短篇小说与诗歌,大多数是英美经典作家的短篇作品,其中就有如高尔斯华绥、霍桑、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桑德堡、狄金森、爱伦·坡、兰斯顿·休斯,但有幸发表的很少,只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和两首诗歌,处女作是从英语转译的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短篇小说。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让我痴迷、让我癫狂。译着,并快乐着——这是我曾经的生活方式,只是现今太多的事务性工作让我告别了那样一个没日没夜的发烧友式的生活,但愿这样的告别只是暂时的。

本书各章内容虽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但内在体系并不“散”,我的研究一直是有意识地分成语言、诗学、文化和翻译实践这四条线走的。在这次成书的过程中,又融进了这么多年来同行们对这些文章的反馈和自己的反思,对原来的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作了修改和完善,并按书的架构加以体系化,加强相互之间的关联和承接。

全书共分四编,分别从语言、诗学、文化和翻译实践四个方面展开对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学无止境,读书越多,越觉有读不完的书,越觉心中没底;很担心书中某一观点,会不会在我还不很了解的另一学科中是谬误。

诚惶诚恐地将这本小书奉献给译学同行和同学,希望你们给我批评。

最后,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导师申丹教授对我多年的教诲,感谢许钧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拙作写序,感谢谢天振教授和王宁教授对我撰写本书的鼓励,感谢学术界无数前辈和同仁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2013年1月1日

于广州番禺

目 录

序(许钧)	1
-------	---

自序	1
----	---

第一编 连贯的张力：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第一章 语法连贯	3
----------	---

第二章 语义连贯	21
----------	----

第三章 语用连贯	38
----------	----

第四章 文体连贯	58
----------	----

第二编 形式的魅力：翻译的诗学研究

第一章 解构“忠实”	
——翻译神话的终结	81

第二章 反思“通顺”	
——从诗学的角度看“通顺”在文学翻译中的副作用	102

第三章 译家与作家的意识冲突	
——文学翻译中的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117